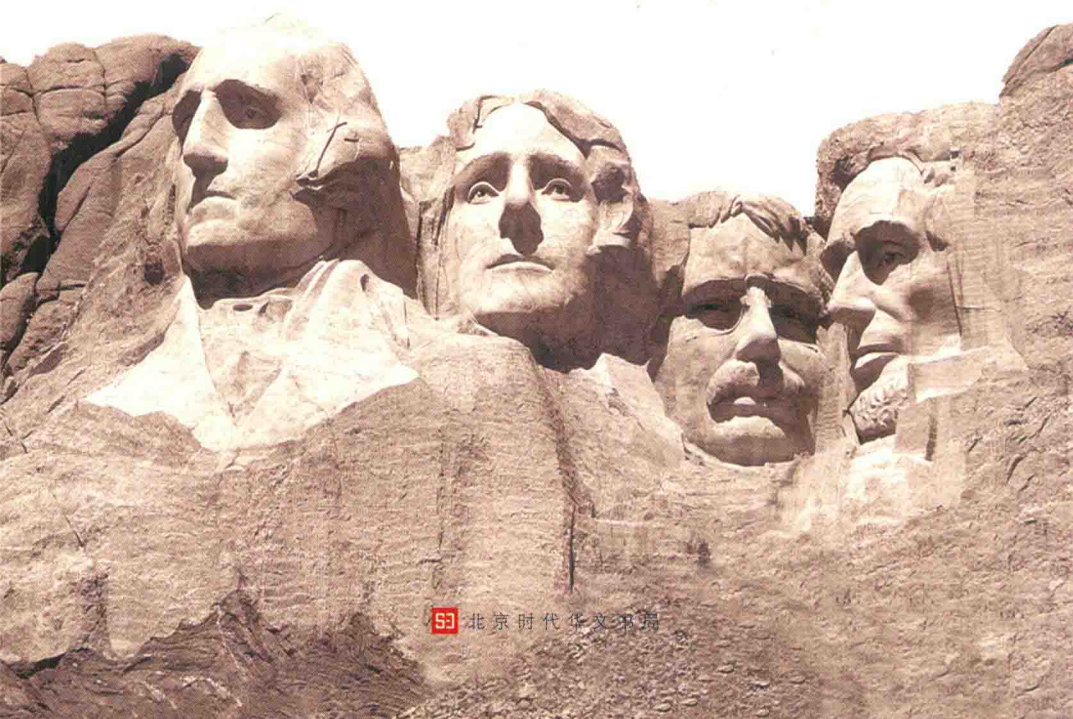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美国文明的兴起

[美] 查尔斯·比尔德 著
杨军 编译

下册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美国文明的兴起

[美] 查尔斯·比尔德 著
杨军 编译

下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文明的兴起 / (美) 查尔斯·比尔德著 ; 杨军
编译.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 2

ISBN 978-7-5699-2245-5

I. ①美… II. ①查… ②杨… III. ①美国—历史
IV. ① K712.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1917 号

美国文明的兴起

MEIGUO WENMING DE XINGQI

著 者 | (美) 查尔斯·比尔德
编 译 | 杨 军

出 版 人 | 王训海
丛书策划 | 梁明德
责任编辑 | 周连杰
特约编辑 | 廖 丹
封面设计 | 格林文化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 0316-365658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42.25 字 数 | 1048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245-5
定 价 | 168.0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查尔斯·比尔德 (Charles Austin Beard)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史学经济学派创始人、美国进步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和重要的宪法学家和历史学家，曾被誉为“二十世纪复杂社会中松了绑的伏尔泰”。

由于倡导“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同名著作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84年出版)而被称作“进步史学运动的代表”。在所谓宪法的“原旨解释”兴起之前，比尔德的范式在美国宪法的解释中占据重要地位。即使在今天，比尔德这种深受马克思唯物史观影响的冲突史观仍然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目 录

【下卷】工业时代

- 第十七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002
- 第十八章 美国的第二次革命/ 044
- 第十九章 大陆的扩张/ 097
- 第二十章 企业的凯歌/ 130
- 第二十一章 全国劳工运动的兴起/ 162
- 第二十二章 农业的三重革命/ 194
- 第二十三章 谋财与享乐的政治/ 218
- 第二十四章 征服更多的世界/ 268
- 第二十五章 镀金时代/ 300
- 第二十六章 美利坚帝国/ 385
- 第二十七章 走向社会民主/ 433
- 第二十八章 力量均势中的美国/ 494
- 第二十九章 正常状态的追求/ 538
- 第三十章 幻影的破灭/ 579
- 第三十一章 机器时代/ 604

【下卷】 工业时代

第十七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假如南北方的经济制度一成不变，抑或是变化迟缓，没有造成社会结构的巨大混乱，那么，只要不断效仿1787年、1820年、1833年和1850年的补偿策略，就有可能无限期地保持力量均衡，并由此将原有的敌对情绪始终限制在折冲樽俎的局面中。然而，无论是在美国经济上，还是在与此具有多样性和相关性的道德观念中，都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成不变的。

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生产制度的需要正在酿造严重的后果。东北部工业化旋风所蔓延的范围正日益扩张，西北部的农业由于制造业的不断补给，从而导致种植园主所要亟待开发的处女地正在有规律地逐级递减。上述情况无不以十分微妙的方式改变着各种力量，迫使那些政府人士不得不拼命地进行改制，企图保持各方和平共处的态势。在这三个地区里，凭借铁路、电报和报刊的发展，进而让旅行和通讯变得既廉价又快捷，由此将那些经济地位和观点相似的人们聚集在了共同的活动中，形成了一种向心过程，这致使社会一体化程度日益不断增强。最后，因为财富的积累与空闲的增加，导致释放出的社会智力——又被扩大的读者群与著作市场刺激——愈加精确地促进了当时各种社会集团的言谈模式的形成，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集团一体化。

1

随着时光的流逝，杰弗逊农业集团里的各种种植园主们依然始终激情饱满地认为：反对任何党派——最初的辉格党，以及后来的共和党，实质上就是一种利益集团的联合，无非是以掠夺生产管理权与土地劳工作为其组成目标。

他们始终标榜，他们所遇到的政敌个个贪得无厌，乃是导致国家内部各种意见四分五裂的根源。1860年，密西西比州的鲁本·戴维斯曾说：“人类社会所从事的各种行业（除农业）中，没有哪个行业不通过立法的帮助，就能扩大自己的利润，然而一切行业几乎都在以牺牲人类上最重要的行业——农业作为代价。……那些利益集团有共同的掠夺目的，因而已联合起来，并一起利用政府作为自己的活动工具，从而将它沦为一个强权帝国。如今，这群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共同站在各个农业州的对立面，这也就是为什么政治组织遭受地震般动摇的这场冲突的原因。”

对奴隶制度的愤恨，也仅仅是遮掩其他企图的一种借口罢了。“贪婪行为正在以她冷酷的铁骑肆意践踏宪法。”这些“贪婪”的家伙已将“各农业州死死捆锁在北方的山岩之上”，犹如秃鹫那样，生活在它们的繁荣上。

正因为拥有普罗米修斯挣断锁链的勇气，从而激发了他们攻击奴隶制的行为。“这些州就像巨人一样在斗争”，戴维斯继续说，“并且让那些利益集团联合体感到惶恐不安，总担心这些州摆脱那些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束缚；正由于这样，那些利益集团猛烈地攻击南方各州的奴隶制。”

那些自由土地的标榜者仅仅针对准州范围内的奴隶制扫射，杰弗逊·戴维斯根据这个事实断定这中间隐藏着反对各农业州的不可告人的阴谋。因此，相比自由土地者，他对废奴主义者表示了更多的尊敬。他

说，后者出于真诚的信念，将任何地方的奴隶制都视为邪恶的，任何人都得到自由的权利；前者对各州的奴隶制并不进行实质性攻击，而仅仅愿意废除那些有机会参加联邦的各准州的奴隶制度。

戴维斯是一个敢冒险的挑战者，他把矛头直接指向参议员里的对头，指责他们利用奴隶制度作为幌子来蒙骗那些单纯的人们：“诸位自由土地党们，你们在建议什么？你们的建议是希望改善奴隶的条件吗？完全没有。那你们到底在建议什么？你们所说的反对扩大奴隶制……奴隶们因此改善了处境吗？丝毫没有。如今你们向全国所标榜的立场，并不是为人道着想……其实你们只不过企图趁机欺骗我们，你们打算让奴隶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受到限制；你们是想能在美国国会中赢得多数座位，来把政府沦为北方扩张的一架机器；你们是想用不公正的伎俩从南方谋得的财富，来发展自己地方的繁华与势力，犹如一个吸血鬼从自己的猎物身上暗地里吸血，直到把自己灌得脑满肠肥……你们是想将南方各州的政治权利削弱掉；那是为什么？原因就是，你们要通过不公正的立法体系，把南方人民及其工业当作牺牲品，最终去让新英格兰各州的工业得到大发展。”

杰弗逊·戴维斯注定要做南部邦联总统，他时常担心的是，那些想在各准州中禁奴的党派，其真正的企图到底是什么？这个党并没有宣称奴隶制度存在道德上的弊端，从而要求像进行外科手术那样给予重创治疗，他只是想让那些新州在他们加入联邦之际，不会受到奴役制度的束缚——它所考虑的结果是，在美国政府中赢取支配地位，并让国家能始终如一地遵循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为争取北方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尽可去剥削南方地区。

不过，就像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种植园主对人口统计表毕竟是持反对意见的。北方工业的高速发展，铁道线的快速延伸，对外贸易向世界各地的惊人扩张，西部农业区在运输和信贷方面对制造业与金融业核心地带的依附，由于移民导致的州意识的破坏，外来侨民的入侵，民主党流域（即密西西比河流域，译者）各个新州的建立，州际商业中民族主义倾向的高涨，北方人口的膨胀，资本主义冰川向南方的扩散：所有这些都证明论者所偏好的“自由劳动制度”的最终胜利。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演进，比起种植园主在有限的土地上使用那些低效率的工人以及肥力不断减弱的土壤所进行的经营，它更是强大许多倍。那些与时俱进的人们无不雀跃欢呼机器工业的胜利将要到来，同样也是在警告种植园主们将要成为被淘汰对象。

在那些被登记在人口统计表中的政治家——代表着强大无比的力量——看来，种植园主反对派是一个强大的、自觉的和紧密的经济联合体，并对其政治目标——掌控美国政府，抵制不利的立法来保护自己，统治各大准州，以及实行全国逃亡奴隶法——显示得极为热衷。所以，北方那些政客们嘴边挂的口头禅无非就是“奴隶政权”了。在《国会环球报》中，作者在谈及“奴隶制度”以及它对这个国家的影响时，总是一副怒不可遏的态度。然而，只有纽约州的威廉·西沃德才以自己熟悉的知识对它进行了描述，进而被誉为经典。

西沃德从自身的经验中得知，政党并非仅仅是为了讨论抽象理论的团体。他说：“每个政党，其实就是一个合股公司，从某种意义而言。其中哪个人贡献最大，谁就有资格影响它的运行和管理。蓄奴主在财力方面对民主党有最大的贡献，因此他们就必然会有资格规定和支配它的

各项政策。日常的党内核心会议制度，便使得他们在貌似公平合理的形式上实现这一点。”西沃德继续表示，仅仅34.7万人的蓄奴主阶级，主要分布在特拉华到格兰德河之间，它却拥有该地近乎所有不动产，以及三百万以上的其他“百姓”，这些人被排除在公民权和政治权之外，禁止“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投票自由、教育自由、创作自由和群众集会自由。……蓄奴主阶级几乎已上升为各个蓄奴州的统治力量，并有权选择参议院62名议员中的30名，众议院133名议员中90名，以及295名美国总统和副总统选民中的105人。”

西沃德越谈越具体，他谴责现任总统是一个“公然替蓄奴主阶级做辩护的家伙”。经过对参议员的组成考察之后，他发现那个地方完全不存在什么自由的可靠堡垒。他并不需要尊重那些身披貂皮长袍的法官，因而也没放过最高法院。他不无讽刺地说：“最适宜开庭公告的，莫过于用这样的祈祷作为结尾：‘上帝保佑美国与这个正直的法院’……这个法院有一名大法官与8名法官。其中5名来自蓄奴州，4名则来自自由州。在这些人被任命时，他们每个人的提议和倾向都会经过总统和参议院的认真审评。据蓄奴主对宪法的解释，没有一个法官被指责在政治上缺乏公正性。而那些来自自由州的，比起那些南方蓄奴州的弟兄们，他们在这方面更为突出。”

接着，西沃德分析了全国政府里的文官机关，比如邮政部、财政部，甚至其他重要部门中所雇佣的数千名官员，他没发现有一个人不忠实于蓄奴主集团。在政治分赃制度中，蓄奴主的统治几乎遍及联邦政府的每一个机关部门。“海关与公共土地局冒出了两股金流——一股流进选举运动中，从而保证蓄奴主阶级的顺利选票；另一股则流进了国库，作为公职奖励金。”甚至更严重的是，北方的宗教、教育、报刊等也处于这一专横阶级的操纵下，它们都小心翼翼地担心惹起它的愤怒。

在对蓄奴制这个巨大的运行机制描述后，西沃德又花费很大精力描绘了那个建立在“自由劳动”之上的对立制度。他对北方的经济发展过程——工业发展、铁路扩展、欧洲的大幅度移民，以及自由农场主的西迁浪潮——考察之后，认为它全面地发展了国家，并将之紧密连接在一起，使得这些“敌对的制度”继续保持更为紧密的瓜葛。于是，他便得出了——一条令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保守公民们振聋发聩的预言：“遏制不住的冲突”，此后的事实也应验了这条预言。

他说，这场残酷的冲突并不是“偶然的，不必要的，也不是自私或者一些狂热的鼓动者所制造的结果，更不是暂时性的”。不，“它是一次制止不住的冲突，存在于两种互相对立而又持久抗衡的力量之间。”有些人打算要求奴隶主们自身通过改革来谋求和平的局面，这种希望很快就消失了，犹如暴风中的谷糠那样。“你们期待这种改革有多久了？但又获得了何种成功？哪个有产阶级自身进行过改革吗？古罗马的贵族、法国的贵族或僧侣也进行过吗？爱尔兰的地主进行过吗？英国的土地贵族进行过吗？难道奴隶主阶级不是用这种虚无缥缈的希望来蒙你们吗？难道它不是变得贪婪、高傲、目空一切吗？”妥协后的所有目的都是“暂时性的与毫无结果的”。所以，只有一项至高无上的任务摆在中国人民面前：“通过对违反宪法和自由的人的一次决定性打击”，永久性挫败和废除（奴隶制）。没用多久，这个预言就以惊人的准确性实现了。在进行了这场控诉之后，西沃德又越出了小心翼翼的一步，向1860年那些有资格的共和党候选人高声呼吁了自己主张。尽管他努力地解释和补充，用来缓和自己的语气，却仍然不能让他的批评者们有所宽慰。

3

一旦两个对立阵营中的有资格的解释者，都同样没能把难以遏制

的冲突看作一种失误的局面，这场争论就会从谈判桌上转移到战场上，从外交调和转为武力解决。双方都在各自处心积虑地谋划，并争取得到舆论的信任。他们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愿望，加速事态改变，实现分配权力的目标，最终达到极端，由此就导致了西沃德预言的那场悲剧的爆发。那些民主党派人士其实不是按照远见卓识，而是根据历史经验来行事的，他们回想起汉密尔顿的领袖屡次在选举中一败涂地，也回想起辉格党没能让韦伯斯特—克莱纲领在全国范围内明确实行，并且希望能继续获得大量集结在种植园主之后的那些农场主与工匠们的支持，因而明显是在幻想政治（被认为是一种票数的统计学）能够解决那些由维持联邦而导致的权力问题。

他们持这样的观点，对1852年总统选举的结果抱着十足的信心。在这次选举中，以墨西哥战争英雄温菲尔德·斯科特为首的辉格党人，最终输给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皮尔斯。确实，群众的裁决是非常残酷的，因为除了四个州外，皮尔斯几乎赢得了其他所有各州的拥护，从而在296张选票中赢得了254张之多。相反，那些自由土地党硬要把奴隶制说成是一种罪恶，并要求各准州给予禁止，虽然只是激起了一丝涟漪，但这导致他们在300万张以上的选票中仅仅弄到了15.6万张，这个数字比上届大选的纪录要低得多。

由于辉格党遭遇失败，自由土地党明显已经缩减为一小撮微不足道的意见人士，民主党则兴致勃勃地操纵了所有行政机关与国会，从而坚信他们的任期得到了保障。他们由于在关税收入限定于亲奴隶制的纲领上大获全胜，就变得一意孤行，就好像汉密尔顿党犹如一小撮废奴鼓动者那样，在所有实际问题上已经无可奈何了。在这之后的1856年的选举中，他们又以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布坎南作为候选人代表，在全国取得了胜利。尽管他们赢得胜利时没有皮尔斯那样的气势，但这完全让

他们坚信，民主党在投票过程中的优势是不会丧失的。

在这段8年的任期里，民主党主办了一系列事情，从而确保了种植园主得以掌控全国，同时也相应地巩固了反对派。随着这个方针的发展，一方面，蓄奴区在无穷的扩张，另一方面，政府则明确地支持和推销工业和商业。这种新方针的首要证据，就是来自皮尔斯上任的当年。1854年，国会冒着风险果断地将密苏里妥协案废除了，并将路易斯安纳购入的大片土地向奴隶制开放，而这要放在三十年前，当时的契约肯定是不允许的。拥护奴隶制的人们马上就从密苏里涌进了堪萨斯，决定让它渗入南方的势力范围内。那些好战的党派对仅仅征服西部禁区并不感到满足，在亲奴隶制的领袖率领下，他们还打算夺占古巴与尼加拉瓜，美国三位身在海外的公使忽然提出了令人震惊的宣言（即所谓的“奥斯坦德宣言”）——美国有足够的理由，可以动用武力将古巴从西班牙夺过来——这种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甚至让华盛顿的民主党政府被迫给予否决。

在密苏里妥协案被废除之后，最高法院又火上浇油地做出两大决定：允许美国扩大奴隶制，甚至在北方对这种特殊制度采取高度保护措施。1857年3月，在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判决中，法官坦尼表示，从一开始密苏里妥协案就是失效的，根据宪法，国会在任何时候都没权禁止美国范围内的任何地区的奴隶制。种植园主集团这次取得的司法胜利，又继承了1859年的另一个决定，在这个决定中，最高法院维护了奴隶逃亡法以及所实施的严厉程序。对那些诚惶诚恐的废奴主义者而言，只要再进一步，就会很容易让全国的解放奴隶运动变成违宪行为。

除了这些维护奴隶制的非常措施外，影响北方经济利益的，还有其他一些致命的措施。1859年，国会下令取消了对大西洋航线各轮船公司的最后一次补贴。1857年，对关税的再次削减，已清晰地表明了全国正

在向自由贸易迈进。南部和西南部的议员们，几乎都对这个行动表示一致的支持，同时还使许多新英格兰各州的议员们加入他们的阵营，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在实质上削减棉织品的关税。另一方面，中部与西部各州，有一大批人数在反对削减关税，因此，这使得此次分野具有了征兆性。

在新的岁入法实行不久，一次工业危机就在全美国爆发了，导致商人与自由劳工纷纷遭受了苦难。当这场风暴进入高潮时，民主党政府滥发的纸币，达到了疯狂的极端，各大非法经营的银行所发出的票据，犹如洪水一般，将整个西部和南部淹没殆尽，致使各地的金融机构纷纷倒闭，只在短短的五年之内，印第安纳州就有51家关门大吉了。从此，汉密尔顿财政体系要想复兴的希望都化为了泡影，那些认为国家繁荣不能没有健全通货的人，已经被逼入了绝望的边缘。在经济灾难达到极端时，布坎南总统再次否决了宅地法，在那些等得不耐烦的农业派再三要求下，国会最终不得不勉强妥协才通过此法。总统的这项独立行动，将农场主和工匠惹怒了，因为，这些人已把国家领土当作自家的继承物。

4

在一系列震惊的事件中，有两件事应当受到特别关注，因为在这场斗争中，它们的辩论术极为突出。此即：废除密苏里妥协案与判决德雷德·斯科特案。在关于这两个西部的新准州——堪萨斯与内布拉斯加的组织问题上，1854年国会规定，只有允许它们参加联邦时，才可以依照各自的宪法规定，来决定奴隶制是否应该存在这些准州地。密苏里妥协线以北，因此，实际上这个规定就推翻了长期以来国家这两个区域所遵守的庄严谅解。为了将一切怀疑扫除，国会还公开宣称，由于它违背了不干涉准州中奴隶制的这条原则，所以，1820年的密苏里契约已经失效。

这一纲领的作者，通常认为是民主党的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而且据说他之所以会如此做，是因为他企图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尽管道格拉斯接受了废除密苏里妥协的过错和荣誉，但该州的参议员艾奇逊却声称是他本人引起的这一行动。艾奇逊是当地奴隶主的代言人，急切地想冲入西部的繁华地带。美国政治的性质，很有可能造成了后一种观点。

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点。这场政治伎俩的主要特征，在于国会对废除该案的表决情况。在参议院中，14位南部民主党、9位南部辉格党人，及14位北部民主党人，都投票赞成这个法案；4位北部民主党人、6位北部辉格党人、2位自由土地党人、1位南部民主党人与1位南部辉格党人投反对票。简而论之，在参议院里有2位南部议员持反对观点。在众议院里，其中的100张反对票中，来自蓄奴州的有9张，另外北部的民主党人是从中分裂出去的，人数达42位，加入了异己者的阵营里。不论从哪一方面考虑，这种分歧都有着不祥的预兆，因为密苏里妥协案的废除，符合了那些一贯支持民主党的几乎整个南部各州的要求。同时它还获得了北部民主党的某些分派的支持——这给种植园主带来的胜利，仅次于卡尔霍恩的极端要求。诚然，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对那些即将被允许加入联邦的各州，并没有强迫去实行奴隶制，却推动了各准州奴隶制度的合法化，并允许当地居民有权自己做出最后的选择。

种植园主集团如果要想谋得美国全部准州的土地，并还希望永远在权力均势中保持自己的力量，那么在司法上它就不得不采取另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即最高法院的一项决议，它宣布国会没有资格依照宪法去废除或禁止任何准州内的奴隶制。假如宪法能这样解释，那么，在国会能取消实施这项法令前，就必须推翻这个决定，要么提出一项新的修正案。由于法官属于终身职位，并且下一轮的委任必须得到参议员的批准，所以要让主管

当局重谈议案的几率非常渺小。另一方面，要想通过一项修正案，必须得到3/4的州批准，因此想用这个策略去推翻决定，是不可思议的。假如这种被盼望已久的解释能够实现，各州的种植园主恐怕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了。至少，那一代的聪明者大约都是这样想的。不过，在这所有算计当中，还忽略一个因素，即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1856年，这个重大的争论问题，或者是因为意外，或者是因为存心，终于以著名的德雷德·斯科特案件提交给了最高法院。斯科特的身份是奴隶，他被主人带到了路易斯安纳准州的北部地区。在当时，密苏里妥协案至少在理论上依然有效，该地区禁止实行奴隶制。这个奴隶在当地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又返回到密苏里州，他以曾去过自由的准州为理由，请求获得自由。那么，他到底是一个自由民，还是一个奴隶？整个事件就这么简单。

最高法院原本可以用几句话解决这个问题，不需要牵涉密苏里妥协案或者国会在美国各准州废除奴隶制的权力。法官们原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处理这一案件说：“不论斯科特在路易斯安纳北部地区时的身份怎样，当他居住在蓄奴区时，就恢复了奴隶的身份，因此，现在他仍是一个奴隶。”确实，当这件事在进行初次辩论时，就得到了多数法官的认同，这个问题也应该就如此决定，不再牵涉到后来会轰动全国的棘手问题。然而，当意见达成共识后，大多数人因为各种理由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以致最终大法官坦尼对处理这一案件又发表了无关紧要的意见——国会的法案是完全没效的，国会不能合法地将准州中的奴隶制废除。这样，他就给年轻的共和党人猛烈一击，因为此党的基本宗旨就是，国会应该在每一个准州中建立起自由制度；明显，这位大法官忽视了那些各类反奴隶制的鼓动者。

南部的政客们认为，如今这个问题已经在终审局的命令下解决了，